

从考古看华南沿海先秦社会的发展

吴春明

摘要 华南沿海约自西周起跨入青铜时代的门坎,战国前后产生国家文明。先秦社会发展滞后的原因是生态特殊性与地理封闭性。

关键词 考古 华南沿海 先秦社会

一 问题与方法评述

福建、两广间的华南大陆沿海地处武夷山以东、南岭以南,是先秦两汉闽越、南越、西瓯、骆越土著的活动区域。对这一时空社会文化的发展,史籍无明确的答案,迄今考古学的解释也仍是两类完全对立的意见相峙。

“滞后论”者主张华南沿海先秦社会的发展水平远落后于中原。早在50年代,林惠祥就明确提出闽广地区“春秋时代以前”处于新石器时代。何纪生等认为广东“约从春秋开始进入青铜时代”,“逐步踏入奴隶社会的门坎”。区家发还说整个先秦时期岭南地区没有进入青铜时代和阶级社会。黄展岳虽承认两广地区在春秋或稍早一些已经出现了青铜文化,但坚持两广先秦社会尚未脱离原始社会。^①

“同步论”者认为先秦的华南沿海基本上与中原地区是同时进入青铜时代和文明社会,将南方商周时期印纹硬陶文化看成“应是奴隶社会,青铜时代”文化。在福建,陈龙等认为从商代“黄土仑印纹陶制作技术和工艺以及强烈的仿铜器作风判断,这是一批比较成熟的青铜器时代的陶器群”,“黄土仑文化还不是福建境内最早的青铜文化遗存,它还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陈国强等也认为“福建地区商周时期也同邻省其他地区同时进入青铜时代”和阶级社会。在两广,常将龙山至夏代前后的石峡文化第三期墓葬看成“原始社会末期的墓葬,已明显地出现了私有制和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原始公社开始走向解体”。杨式挺将夏商时期的石峡中层类型等看成是“初露头角、各具特色的商周时期青铜文化”。^②

除部分人所依考古资料的断代尚须修正外,上述认识中的多数具有不同程度的方法论缺陷,这是意见不能统一的主要原因。(1)“同步论”者常混淆了“时代”与“文化”这两个非常重要又完全不同的概念,一概将华南沿海“商周时期”文化等同于“商周”青铜文化和奴隶社会阶段。仅因几何印纹硬陶文化的鼎盛与商周文明共时,而忽视边远地区古代文化发展的特殊性,不考虑小时空的印纹硬陶是否与青铜器共出、是否具备文明社会的证据,就直接冠以“青铜时代”、“文明社会”。(2)一些“同步论”者不愿承认所在区域古代社会发展落后的一面。近20年来,文化多样性和文明起源多元论的研究被推向极端,各地都力求在中国早期文明的“满天星斗”中

找到位置,不切实际地在华南沿海强求与夏商周相同步的“文明火花”。(3)两类论者多不能合理区分技术史与社会史这两类概念。“文明”是社会组织结构发展的最高级阶段,“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③文明的产生虽以技术的进步为基础,但文明史和技术史间没有具体和必然的联系,如欧洲大陆的文明史常伴随着成熟的铁器文化,美洲的玛雅文明则是以新石器器和铜石并用文化为基础的,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则与青铜文化一同肇始。但除黄展岳等少数学者外,对立意见的双方均在未证实先秦华南沿海与商周文化统一性的前提下,就直接借用商周模式,将华南沿海技术史上的青铜时代直接视为社会史上国家文明出现的证据。

二 技术发展史的考古重建

近 10 多年来,随着可靠的地层与墓葬资料的积累,基础编年研究的深入,^④华南沿海先秦古文化区系类型的基本格局已经确立(见表),为重建技术史与社会史奠定了基础。

| 战国 | 富林岗类型 | | | 米纹陶类型 | | | | | 铁器时代 | 国家文明 | |
|----|-------|-----|-------|-------|-------|-------|------|-------|--------|----------|------|
| 春秋 | 铁山类型 | | | 浮滨类型 | | 夔纹陶类型 | | | | 青铜时代 | 过渡时期 |
| 西周 | | | | | | | | | | | |
| 商 | 黄土仑 | 白主段 | 蚁山 | 水口山 | 河宕 | 东澳湾 | 石峡中层 | 大石铲文化 | 新石器时代 | 原始社会 | |
| 夏 | 昙石山上层 | 马岭 | | 虎头埔 | | | | | | | |
| 年代 | 下游 | 上游 | 闽南 | 粤东 | 三角洲 | 沿海 | 北江 | 西江 | 技术发展序列 | 社会组织演变序列 | |
| | 闽江流域区 | | 粤东闽南区 | | 珠江流域区 | | | | | | |

在夏、商两代的各分域文化中,技术发展水平是相当原始的,可靠地层和典型遗迹单位中共出的生产工具均以石器为特点,不见任何青铜器具。昙石山上层和黄土仑类型常见小型石镞、镞及骨、贝器等工具;河宕和石峡中层类型也多是西樵山式的中小型石镞、有段石镞、有肩石器等,石峡中层多一些适于农耕的大型和长身石器,东澳湾类型更多石镞、网坠等渔猎工具。这些工具组合均没有向青铜工具形态过渡的迹象,两区系内零星采集的青铜器中也无明确早至商代的铜器。唯广东饶平、广西武鸣和兴安等地曾发现几例采集或窖藏的具有“商代晚期特点”的铜器,均无明确的周以前器物共出,埋藏的时代不大可能早到商代。^⑤因此,夏、商时期该地没有进入青铜时代的确凿证据,仍然停留在新石器末期阶段的发展水平。

西周春秋时期诸分域类型的地层、墓葬单位和零星采集品中,已发现了不少青铜器具,成为华南沿海早期青铜文化的内涵。如东张上层、溪头上层、石峡上层等铁山、夔纹陶类型的典型地层都不同程度地发现了青铜镞、短剑、矛、钺、锥等兵、工类器具,仅石峡上层就发现 23 件。墓葬中的共出铜器更丰富,南安大盈寨山出铜戈(戚)、矛、镞、铃等 20 件,采集铜斧 1 件,附近发现了具有浮滨类型特点的石、陶器;政和铁山蚌山春秋墓出铜剑、矛等 3 件,与铁山类型陶、瓷器共出;武鸣马头元龙坡西周墓群发现铜盘、卣、刀、矛、钺、斧、匕、镞、镞等 110 件。此外,该时空考古发现中还有一批零星采集的青铜器,与上述地层及墓葬包含物的特点一致,应属于同一时期的遗存。如福建建瓯的 3 件西周铜铙(甬钟);广东信宜光头岭 1 件西周铜盃,曲江马鞍山 1 件西周铜铙,连平彭山春秋钟、淳于各 1 件;广西灌阳的 1 件西周铜铙,宾阳木荣村西周铜、

钟各 1 件,荔浦马蹄塘、陆川塘城春秋铜罍各 1 件等。^⑥这些青铜器说明西周春秋的华南沿海已进入青铜时代,但还不是大量的,类别也主要是兵、工器具,处于青铜时代的早期。

在春秋末至战国早期的夔纹陶类型晚期墓葬中,青铜文化进入鼎盛阶段。广东清远马头岗 M1、M2 出铜鼎、罍、缶、钟、钲、镞、矛、斧、剑、戚、铍、人首柱形器等计 64 件;四会乌旦山 M1、高地 M1、M2 出青铜鼎、盃、铎、鉴、洗、戈、矛、剑、钺、斧、人首柱形器、半球形器等计 76 件;罗定夫背山 M1、南门洞 M1、M3 出铜鼎、鉴、盃、缶、钟、钲、钺、镰、戈、矛、斧、剑、镞、人首柱形器等 235 件;怀集栏马山 M1 出铜鼎、斧、人首柱形器等 7 件;和平龙子山 M1 出铜鼎、钺、戈等 5 件。广西恭城秧家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残墓出铜鼎、罍、尊、钟、短剑、戈、斧、钺、铍、兽首柱形器等 31 件。^⑦从总体上说,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含大量青铜器和较多礼、乐、盛食器的铜器墓,青铜文化进入了鼎盛期。

战国中晚期起,在青铜文化继续发展的同时,出现了早期铁器文化的萌芽。在米纹陶类型的墓葬和地层中,广东德庆落雁山战国晚期 M1 出土铜鼎、铎、矛、剑、斧、越、镞、铍等 15 件;罗定南门洞战国晚期 M2 出铜剑、矛、刀等 4 件;肇庆北岭松山战国晚期(或秦汉初期?)墓出铜鼎、壶、三足盘、编钟、提桶、斧、铍、铲、刻刀、镜、人首柱形器等 108 件;广宁铜鼓岗战国 M2—M22 发现铜鼎、盘、剑、矛、钺、斧、凿、锄、锤、削、铍、半球形器等 295 件;宾阳韦坡村战国晚期 M1、M2 出铜鼎、钟、剑、斧、钺等计 20 件;始兴白石坪战国遗址的铁斧、钺是该类型发现铁器的最早地层。广西平乐银山岭战国晚期(秦汉初?)110 座墓共发现 377 件铜器与 181 件铁器。^⑧

可见,华南沿海地区约于西周开始才进入青铜时代,战国中晚期产生最早的铁器文化,这较之中原地区分别要晚 1000 余年和数百年,比太湖、赣鄱流域等百越系统北部地带也落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

三 社会形态演进的考古观察

聚落、墓葬考古与文献资料的综合已经可以初步勾画出华南沿海先秦社会组织结构发展的图景,华南沿海的文明史并不等于青铜技术史。

夏商时期的聚落考古资料基本上反映了原始社会的组织形态。内陆河谷、沿海贝丘与沙丘是这一时空的几种基本聚落形态,这些聚落类型在宏观布局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接近生态富源和利于攫取经济活动需要的群落散布,聚落的自然取向性明确,缺乏黄河、长江中下游龙山时代即已出现的那种以发达农耕经济为基础、围绕中心聚落分布的、具有复杂人文取向的等级结构。目前虽未发现单个聚落的完整平面遗迹,但从分散发现的单体房屋遗迹看,有半地穴式、地面式、干栏式、洞居、岩棚、窝棚等多样类型,都是因地制宜制造的小型居所,缺乏结构完善的大中型建筑基址。这些只能是原始社会中的比较平等的群团——氏族、部落的聚落遗迹。埋葬遗迹也有类似的线索。黄土仑、石峡中层、河宕等墓地已发现百余座墓葬,均小型土坑墓,无随葬品或随葬陶、石器几件至 10 多件,女性多用纺轮,男性多石器,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剩余财富的积累极有限;成员之间具有较小的分层差别和明显的两性自然分工,不属于阶级对抗的范畴。迄今为止,这一时空考古中还不见结构与内涵复杂、或伴随杀牲与殉葬现象的大、中型墓葬,没有“奴隶制时代”的任何证据,国家文明还是很遥远的事情。

随着早期青铜时代的到来,西周以后华南沿海的社会组织结构出现了一些初步的变动。建瓯、灌阳等地发现的西周铜钟(铙)与同期江南各地发现的用于军旅集会或祭祀山川的南方大铙相同,青铜兵器中常见剑、矛、戈,与吴越文化兵器组合规律相同,说明商周、吴越这些先已发展成熟的国家集团中上层社会的某些礼乐制度、祭祀与军兵法式已影响到这一地区。阶级分化、冲突正在发展,国家文明社会的一些现象正在起源。大盈、铁山等以随葬青铜兵器为主的墓葬不是一般的平民墓葬,应是社会上层的部落首领或军事头目的墓葬;元龙坡的一些墓葬不但发现了兵器,还随葬铜卣、盘等精美贵重的盛食器,说明一些上层贵族与一般平民的距离在扩大。这些线索表明,在夏商时代的那种简单朴素的原始社会组织结构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只有文明社会才具有的复杂现象。但是,这种文明社会因素还只是初期的,上述铜器墓葬的规模只能是小地域内群团首领或部落酋长一类,缺乏较大型墓葬和城址的发现,说明具有大范围控制能力的“王国”还没有出现,大致处于国家文明的起源阶段。

约从战国起,华南沿海的社会发展史已经跨入闽越、南越等民族所建立的“王国时代”。第一,华南沿海上层社会所仰慕的周楚式的国家文明生活制度已全面、深刻地传入。以青铜鼎为代表的礼器的使用成为春秋末期以来岭南铜器墓的重要特点,这在先期墓中是没有的,有些墓葬还直接使用周楚式的兽足鼎,虽然没有周楚式严格的用鼎制度,但用鼎数与墓葬规模也相一致;有些墓葬和窖藏使用成套编钟,虽没有像周、楚编钟的规律可寻,但也大小相配。说明在周楚地已衰弱的“周礼”开始在华南沿海社会中发育,成为这一边缘地带社会历史发展步伐已经靠近岭北的重要标志。第二,在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之中产生了以“王”为最上层的国家组织结构。含青铜器和礼乐器的大、中型墓葬多随葬具有权仗性质的铜人、兽首仗头,部分仗头及矛、钺上铸有“王”字符,这些是先期的部落首领或酋长墓所不能比拟的,应是与国王或其宗室有密切关系的上层人物的墓葬。其中恭城秧家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残墓发现铜器 31 件,用鼎 5 件,兽首仗头 2 件,这是岭南最早的一座高规格墓;肇庆松山墓长 8 米,宽 4.7 米,深 6 米,木椁漆棺,随葬品达 139 件,用鼎 5 件,人首仗头 4 件,是岭南最早的大型墓。依周礼,五鼎“少牢”是仅次于诸侯王的卿大夫特权,《国语·楚语下》载:“卿举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举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鱼炙,祀以特牲。”这些五鼎墓“很可能是属于‘君王’一级的南越郡国上层统治者”^⑧。第三,文献中还有华南沿海先秦王国的线索。据《史记·东越列传》,秦初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被“皆废为君长”,汉五年“复立”为闽越王和东海王,说明闽越及东海是先秦已有的古国。闽越都东冶旧址今福州一带的秦汉遗存也多上限至战国晚期。南越国也是如此,《淮南子·人间训》载:秦攻南越时发兵 50 万,“三年不解甲弛弩”;《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说:“旷日持久,粮食绝乏,越人击之,秦兵大败。”南越军已不是部落社会的弱旅,而是可与强大的秦国大军抗衡的组织严密的卫国之师。南越国都番禺也不是汉初几年建成的,《人间训》载秦兵来攻时兵分五路,其中“一军处番禺之都”,可知也是早已繁荣的先秦古都。^⑨就是说,从战国时期起,华南沿海已经建立了国家文明,其就是汉初“复立”的闽越、南越等王国的直接前身。但这已较夏商文明落后了 1500 年左右。

四 社会文化滞后的原因探讨

华南沿海先秦社会文化长期滞后于夏商周与吴越地区的主要原因是生态环境的特殊性和

半封闭的自然地理格局。

(一) 南亚热带和边缘热带的湿热生态环境有利于野生动植物种群的多度与丰度繁殖,成为早期人群源源不断的天然食物,这长期制约着生产性经济的发展,使得国家文明所应具有的最起码的物质文化基础迟迟未能形成。

夏商时期是原始的“攫取经济”的残存期。依据全新世地质与古气候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持续温暖,气候较现在南移若干纬度线,成为历史上野生动植物种群最高度的繁殖期,为采集、渔猎经济活动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农耕活动不具有太大的吸引力。沿海各类型的生产工具均以中小型石器为特点,县石山上层—黄土仑类型的许多小石镞长仅2厘米左右,很难作为单体工具,更不是农耕工具,应是适于采集狩猎活动的组合工具的细小构件。贝丘、沙丘堆积是该阶段的主要遗址类型,大量的水生软体动物躯壳、鱼类、野兽遗骸的发现,都是这一以“攫取”天然食物为主要手段的经济活动的反映,反映农耕活动的遗存非常有限。在江河上游所在的内陆河谷情形有所不同,如石峡中层类型的中小型工具形态与大型石镞、长身石镞等适于农耕的工具形态共出,可能与早期低地农业的适度发展有关,但从总体看,采集和狩猎仍是重要的经济内容。

两周时期是全新世的一次最严重的气候转寒期,生态的剧变必然减少了自然的赐予,对依靠天然食物的攫取式的原始经济形态是个极大的压力,成为迫使生产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青铜斧、钺、刀等先进的农耕生产工具的传入,成为农耕经济有所进展的基础。但是,这些青铜农具还与石器共出,不见青铜犁、锄等,说明农业经济还比较原始,不能与长江、黄河流域发达的农耕文化相比较。只有到战国以来,随着铁农具的使用,生产经济才可能有较大发展,并与秦汉初闽越、南越社会的经济形态接近。^⑩

(二) 武夷山脉、南岭山地连亘于华南沿海西北边境,不但是南北间重要的自然生态分水岭,也是北方文化传入的壁垒。夏商时期的华南沿海仍以落后的土著文化为主体,两周以后吴越与同楚文化才相继传入并带动社会文化的变迁。

夏商时期华南沿海仍以本地区龙山时代以来土著文化的延续为核心,夏、商王朝等文明中心区的文化影响是次要的。各地域类型文化的陶器组合均以圜底器、圜凹底器、圜足器为特点,常见器类主要是圜(凹)底的釜、罐、甗、尊、壶、钵及圜足壶、簋、尊、豆等,极少见三足、袋足器,更不见中原夏商式的鼎、鬲、甗、斝等器,构成一个基本不同于夏、商文化的特殊地带,这实际上是县石山文化、金兰寺下层文化等本地龙山时代及更早的新石器文化中业已形成的土著传统的延续。当然,这些土著陶器中也出现了像云雷纹、回纹等仿商周铜器纹样,大口陶尊等个别有夏、商文化特点的造型,但非常有限,并不成“气候”,更没有出现夏、商式的鼎、斝等青铜礼器组合。在民族史上,他们应就是华南沿海原住的闽、粤、瓯等早期土著的遗存。这一基本封闭的土著传统是早期社会文化滞后、夏商文明中心区成熟的奴隶制难于直接传入的文化背景。

周代以后,出现了吴越、周楚文化明确的相继传播与融合。各类型的金属文化均明显地表现为外来与土著两组因素的复合结构:(1) 铁山类型的青铜器以吴越文化为主、土著文化为辅。圆茎剑、两翼矛是该类型最常见的器类,也是吴越占绝对优势的兵器组合,剑、矛、戈、斧、铍、凿等与江南土墩墓所见及商周器相同或相似。地方特点是是个别的,如光泽浔江矛上的镞形纹、宁德猫头山戈上“人”字形堆饰等。(2) 大盈类型的青铜器具有较多的土著文化因素。直内无胡戈、方釜斧、铃等主要器类也是商周和吴越文化常见的,造型也大致相同或相似;钺形戈(戚)不见

1988年第12期;王振镛:《福建建瓯县出土西周铜钟》,《文物》1980年第11期;徐恒彬:《广东信宜出土西周铜盃》,《文物》1975年第11期;彭绍结等:《马坝发现西周晚期铜铙》,《广东文博》1985年第1期;前引《近年来广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蒋庭瑜:《广西先秦青铜文化初论》,《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⑦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清远发现周代青铜器》,《考古》1963年第2期;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清远的东周墓葬》,《考古》1964年第3期;同名:《广东四会鸟蛋山战国墓》,《考古》1975年第2期;何纪生:《广东发现几座东周墓葬》,《考古》1985年第4期;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罗定出土一批战国青铜器》,《考古》1983年第1期;同名:《广东罗定夫背山战国墓》,《考古》1986年第3期;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恭城县出土的青铜器》,《考古》1973年第1期。

⑧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德庆发现战国墓》,《文物》1973年第9期;同名:《广东肇庆市北岭松山古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11期;同名:《广东广宁铜鼓岗战国墓》,《考古学集刊》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宾阳发现战国墓葬》,《考古》1983年第2期;莫稚:《广东始兴白石坪山战国遗址》,《考古》1963年第10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战国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

⑨邱立诚:《广东东周时期青铜器墓葬制刍议》,前引《广东出土先秦文物》。

⑩吴春明:《闽越故冶地望的新探索》,《福建文博》1994年第1期;徐恒彬:《南越族先秦史初探》,《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⑪前引《广东新石器时代考古若干问题探讨》,《试析东澳湾遗存》;吴春明:《对武夷山脉以东地区史前文化聚落形态研究的几点思考》,《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3期。

作者 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 陈双燕

(上接第97页)

⑨⑩Andocides: 1. 17. 22, 1. 87—89, *Minor Attic Orators I*,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1953.

⑪Demosthenes: "Against Androtion", *Demosthenes* ■, pp. 169~177.

⑫Demosthenes: "Against Androtion", "Against Timocrates", "Against Aristocrates", *Demosthenes* ■, pp. 161~170, 392~417, 227~275.

⑬Demosthenes: "Against Timocrates", "Against Aristocrates", *Demosthenes* ■, pp. 417 ff., pp. 285~295.

⑭Aeschines: "Against Ctesiphon", *The Speeches of Aeschines*, p. 461; Demosthenes: "De Corona", *Demosthenes* ■,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1953, p. 185.

⑮Aristotle: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p. 89; Demosthenes: "Against Timocrates", *Demosthenes* ■, p. 471; Aeschines: "Against Ctesiphon", *The Speeches of Aeschines*, p. 459.

⑯Demosthenes: "Against Aristogeiton", *Demosthenes* ■, p. 527, cf. Aeschines: "Against Ctesiphon", *The Speeches of Aeschines*, p. 313.

⑰Demosthenes: "Against Meidias", *Demosthenes* ■, p. 149, cf. Aeschines: "Against Timarchus", *The Speeches of Aeschines*, p. 33.

⑱Demosthenes: "Against Leptines", *Demosthenes* I, p. 569.

⑲Antiphon: 3. 1. 1, *Minor Attic Orators I*; Aristophanes: *Wasps* 590,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1955.

作者 厦门大学历史系助教 责任编辑 陈双燕